

现代汉语

XIANDAI HAN YU

·增订本·

胡裕树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054371

现 代 汉 语

增 订 本

54123/50

主 编：胡 裕 树

编者(按笔划为序)：

许宝华 张世禄 张枋之

张 斌 杨庆蕙 严 修

范可育 周钟灵 袁 晖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现 代 汉 语

增 订 本

胡裕树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 插页 1 字数 445,000

1962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2版

1981年7月第3版 1986年6月第15次印刷

印数 997,501—1,027,500 本

统一书号: 7150·1286 定价: 2.55元

0731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语言	1
第二节 现代汉语	4
第三节 现代汉语规范化	9
第四节 现代汉语的特点	17
第五节 现代汉语的整体性	21
第六节 现代汉语学科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26
第一章 语 音	29
第一节 语音概说	29
第二节 声母	43
第三节 韵母	67
第四节 声调	88
第五节 音节	111
第六节 音变	130
第七节 语调和朗读	147
第八节 语音规范化问题	160
第二章 文 字	169
第一节 汉字的形成、特点和结构	169
第二节 汉字的字体	189
第三节 文字改革	206
第四节 正字法	220
第三章 词 汇	232
第一节 词和词汇	232
第二节 词的构造	241
第三节 多义词和同音词	250

第四节	同义词和反义词	260
第五节	词汇的构成部分	276
第六节	词典、字典、现代汉语词典	300
第四章	语 法	310
第一节	语法和语法体系	310
第二节	词的分类(上)	316
第三节	词的分类(下)	326
第四节	词组和句法分析	334
第五节	句子和句子分析(上)	346
第六节	句子和句子分析(下)	357
第七节	句子的特殊成分	373
第八节	句子的变化和简缩	382
第九节	复句(上)	389
第十节	复句(下)	399
第十一节	语气和口气	410
第十二节	标点符号	416
第五章	修 辞	428
第一节	修辞概说	428
第二节	词语的运用	433
第三节	词语的配合	451
第四节	句子的锤炼	478
第五节	句式的选择	510
第六节	语体和风格	537
后 记		568

绪 论

第一节 语 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目的。

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是思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

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体系。语言中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决定了每一种语言的基本面貌,因此人们把它们称为“语言的基础”。

劳动创造了语言。一方面,劳动决定了产生语言的需要:人类祖先在集体劳动和制造工具的过程中,迫切要求运用语言交流思想,以协调集体的行动。另一方面,劳动使语言的产生有了可能:类人猿从树上移居到地面以后,逐渐学会了直立行走,手与脚有了分工,视野也扩大了,同时在劳动中逐渐改造了发音器官,大脑机能也逐渐发达起来,这就为语言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人类的语言就这样在劳动过程中,和抽象思维一起,经历了若干万年,逐渐地产生了。恩格斯说:“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①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当然不是经济基础,但又不是上层建筑。每一个经济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随着一定的基础的产生、变化、消亡而产生、变化、消亡。语言却

^①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

不同,基础改变了,它却可以基本上不改变。语言不是随着某一种经济基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在社会历史全部进程中为全社会所创造,一视同仁地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服务。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改变,不是直接的,不是立刻发生的,而是要在经济基础改变以后。而语言则不然,它与人的生产行为和其他一切活动,都是直接联系的。因此语言反映生产中的改变是直接的,是立刻发生的,它的活动范围比上层建筑要广泛得多。

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它的发展速度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密切相关。社会的进步首先反映到词汇中来;由于社会的进步而引起的思维的发展推动了语法和词汇的发展。语言又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社会之间的接触又引起语言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推动了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各组成部分(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相互影响也引起语言的发展,语言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各部分原有的关系可能被打破,从而使各部分相应地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关系,达到新的适应。语言的发展是逐渐的,是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它在发展中不断扩大和改进自己的基本要素。

语言是全民的交际工具,没有阶级性。即使在阶级社会里,它也是一视同仁地为社会各阶级服务。当然,阶级也影响到语言,利用语言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便产生一种阶级习惯语。但这种阶级习惯语只有少量的特殊词语,没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而且使用的范围很狭窄,根本不是什么“阶级语言”,也不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人们有时说:“革命人民和反动派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这并不能说明“语言”有阶级性。这里的所谓“语言”不是语言学上的科学概念,而是“思想意识”的借代用法。因为思想意识是通过语言这个表达工具反映出来的,于是人们有时就用“语言”一词来代替“思想意识”了。作为科学概念,语言和思想意识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人们有时还说:“什么藤结

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也不能证明语言有阶级性。这里的“话”，不是指“语言”，同样也是指“思想意识”。说话总是有一定的目的的，因而也就有特定的思想内容，它可以有阶级性；可是所运用的交际工具语言却是全民的，没有阶级性的。例如唯物主义者说“存在决定意识”，唯心主义者说“意识决定存在”；资产阶级说“资本家养活工人”，工人阶级说“工人养活资本家”。这些话是有阶级性的，但大家共同使用的“存在”、“意识”、“决定”、“工人”、“资本家”、“养活”，这些词是全民的，是没有阶级性的；大家共同使用的语法结构也是全民的，是没有阶级性的。

1950年以前，不少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曾附和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院士的说法，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并且说，只有这个看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有力地驳斥了马尔学派的学说，指出语言是全民的，是没有阶级性的。毛泽东同志也曾明确指出：“语言没有阶级性”，“白话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①

“四人帮”推行一条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把语言同文化、语言同思想意识混为一谈。他们要求“净化”词典的收词范围，规定只准收所谓“正面词”、“积极词”、“政治词”、“法家词”，不准收所谓“反面词”、“消极词”、“生活词”、“儒家词”，否则，就给编辑人员扣上“想把词典编成封资修大杂烩”的帽子。在词典的释义上，“四人帮”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要求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他们把政治庸俗化，要对“一字一词的思想内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批判”，即所谓“要对每一个语词表态”。例如注释“尽善尽美”，就不能仅仅说它是“形容事物完善到没有一点儿缺点”，而必须说它的含义“是反唯物辩证法的，不符合毛主席关于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教导”。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8页。

“太平”一词，也不能说是指“社会平安，安宁”，而要说“在阶级社会里，充满了阶级斗争，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太平，这个词是在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美化反动统治，麻痹劳动人民”等等。

斯大林说过：“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工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①人们的思想观点，是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而表达思想观点的工具——语言，却不属于这个范畴，是对各阶级一视同仁的全民交际工具，为全民族共同服务。语言的词汇及其含义是为全民所共同理解和共同承认的，否则，社会交际就无法进行了。我们一定要批判“四人帮”在语言学上散布的谬论，肃清其流毒，坚持科学的语言学说，大力促进语言学的发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节 现代汉语

一 现代汉语的形成

现代汉语，这里指的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它是现代汉民族用来进行交际的语言，它正在为我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现代汉语是在近代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近代汉语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宋元以后有两种明显的趋势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发生：一种表现在书面语方面，就是白话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种表现在口语方面，就是“官话”逐渐渗入各个方言区域。

汉族在历史上长期用“文言”作为统一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15页。

最初必定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但是后来同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学习起来非常困难，能够使用的人只占全民中的极少数。因此，另外一种同口语直接相联系的书面语——“白话”就起来同“文言”分庭抗礼。这种“白话”就是我们现在的民族共同语书面形式的主要源头。

宋元以来，用“白话”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非常丰富，其中有象《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许多文学巨著。这些作品的语言虽然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地方色彩，但是总的说来，基本上属于北方话。它们流传到非北方话的区域，拥有广大的读者，并且促使非北方话区域的人也用“白话”来写作。因此这种白话文学大大促进了北方话的推广。

口语方面，大约在白话文学作品广泛流传的同时，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也逐渐取得了各方言区之间的交际工具的地位。北京既是元、明、清历代的政治中心，北京话也就成为各级官府的交际语言，并随着政治影响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当时北京话被称为“官话”，实际上它并不是专为官吏阶层使用的官场雅语或阶级习惯语，而是对各阶级一视同仁的语言。

到了本世纪初，特别到了五四时代，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上述的两种趋势就汇合为一，力量更加壮大，这就加速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过程。一方面，“白话文运动”彻底动摇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使一向只用在所谓通俗文学上的“白话”取得了文学语言的地位；另一方面，“国语运动”又给予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北方话以一种民族共同语的地位。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上都有了统一规范的文学语言，改变了早先的言文不一致和方言并立的局面。至此，人们逐渐用“普通话”来代替“官话”这一旧称。“普通话”的“普通”是普遍共同的意思。这说明这时北方话已完全取得了“共同语”的地位了。

解放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的空前统一和迅速发展，由于党和政

府重视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重视汉语规范化工作,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发展更加迅速,它的社会交际效能也大大提高,人们只要顺应着汉语的发展趋势,自觉地推动它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促使它更进一步地规范化,就可以使现代汉语成为更完善、更统一的语言。

现代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全球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使用现代汉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汉语对邻邦的语言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受汉语影响最深的是日本、朝鲜和越南。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在国际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了,因而在许多国家中,学习和研究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于1973年12月18日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把汉语列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文之一。(联合国目前有五种法定的工作语言,除汉语外,还有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

我们是一个共有五十多个民族的统一国家。我们党历来十分强调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号召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各兄弟民族为了相互交际的便利,迫切需要掌握一种各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兄弟民族都自觉地要求选择汉语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

二 现代汉语的地域分支——方言

除了普通话这一全民族的共同语之外,汉民族还有许多不同的方言。象一切语言中的方言一样,汉语的这些方言也是从属于民族共同语的语言低级形式,它们之间虽然有明显的差异,但由于语音上对应规律很整齐,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也大体相同,因而它们并不是同普通话并立的独立语言,而只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支。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日益集中和发展,汉民族共同语的影响必将日益扩大,汉语方言的影响也将逐渐缩小。

汉语的方言现在可以分成八区,它们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一) 北方方言区^① 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中心,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分布地域包括长江以北汉族居住的地区,长江以南镇江以上九江以下的沿江地带,湖北(东南一带除外)、四川、云南、贵州四省、湖南省西北一带。使用的人口约 64700 万,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②本方言区内部有很大的一致性。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直线距离约有 3200 公里,从东南的南京到西北的酒泉,直线距离约有 2000 公里,其间各处的人通话没有困难。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地域,语言这样一致,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

(二) 吴方言区 吴方言也称江南话或江浙话,以上海话为代表。使用人口约 7700 万,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八点四。分布地域包括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部分(镇江不在内),浙江省大部分。

(三) 湘方言区 湘方言也称湖南话,以长沙话为代表。使用人口约 4600 万,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分布在湖南省大部分地区。

(四) 赣方言区 赣方言也称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代表。使用人口约 2200 万,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四。主要分布在江西省(东北沿江地带和南部除外)。湖北省东南一带也属于这一区。

(五) 客家方言区 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使用人口约 3700 万,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四。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省。湖南、四川两省也有少数地区说客家方言的。

(六) 闽北方言区 以福州话为代表。使用人口约 1100 万,

① 北方方言包括“下江官话”和“西南官话”。

②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 1980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宣布,“一九八〇年末,全国人口为九亿八千二百五十五万人。”公报中全国人口数字,不包括台湾省。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 94%,约有九亿二千多万人。各方言的使用人口数是个约略的估计,仅供参考。

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分布于福建省北部和台湾的一小部分。华侨和华裔中也有说闽北方言的。

(七) 闽南方言区 以厦门话为代表。使用的人口约2800万,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分布在福建的南部,广东的东部潮州、汕头一带,海南岛的一部分,台湾的大部分。华侨和华裔中有很多是说闽南方言的。

(八) 粤方言区 粤方言也称广东话,以广州话为代表。使用人口约4700万,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分布在广东广西两省。华侨和华裔中有很多是说粤方言的。

汉语方言在语音上的差异是相当大的。以声母而论,有的成套地保存古浊音,有的浊音很少;有的分别zh、ch、sh和z、c、s,有的不分别;有的分别ji、qi、xi和zi、ci、si,有的不分别。以韵尾而论,有的有-m、-n、-ng、-b、-d、-g,有的只有-n和-ng,有的-n和-ng也不完全分别。以声调而论,各方言区虽然一般都有入声,但入声的具体情况颇有不同。调类的数目普通是四个到七个,有少到三个的,有多到十个的。调类相同的,调值未必相同。

方言的差别也表现在词汇方面。一样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常常有不同的名称,如“玉米”、“棒子”、“苞谷”、“苞米”、“苞黍”、“珍珠米”,“肥皂”、“胰子”、“洋碱”、“番视”,“火柴”、“洋火”、“自来火”、“取灯儿”等等。也有书面形式上相同的词在不同的地方表示不同的意义。如上海的“交关”略等于北京的“很”,广州的“交关”略等于北京的“厉害”;嘉兴的“阿爹”是父亲,苏州的“阿爹”是祖父,广西博白的“阿爹”是外祖父。同一动作在不同的方言里也往往用不同的字眼,如北京话说“穿衣服”,上海话说“着衣裳”;北京话说“喝茶”,上海话说“吃茶”,广州话说“饮茶”。

方言之间的差别也表现在语法方面。如北方话说“给你钱”,广东话说“畀钱你”。北方话说“要看戏吗?”江浙话说“阿要看戏?”不过方言间的语法差异,比起语音、词汇方面的差异来要小得多。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充分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必须积极提倡民族共同语，迅速推广普通话。“普通话是为全民服务的，方言是为一个地区人民服务的。推行普通话并不意味着人为地消灭方言，只是逐步地缩小方言的使用范围，而这是符合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的。方言可以而且必然会同普通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但是必须不断地扩大普通话的应用范围，要尽力提倡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尽力提倡在书面语言中使用普通话，要纠正那种不承认普通话、不愿听普通话、甚至不许子弟说普通话的狭隘地方观念，纠正那种在出版物中特别是文学作品中滥用方言的现象。”^①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方言同民族共同语的关系，自觉地促进民族共同语的发展，缩小方言的影响，不但自己积极使用普通话，而且还要努力推广普通话。

第三节 现代汉语规范化

一 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意义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虽然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完善的阶段，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统一。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汉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方言分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汉语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是不利的。现在，全国政治、经济空前统一；不同地区的人要到一处来集会，要在一起工作；干部要在全中国范围内调动；军人要离开家乡到远方去服役。没有统一规范的共同语，许多工作都将遇到困难，甚至招致损失。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如果没有一种统一规范的语言，就不能迅速地发展文化、普及教育。我们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之下加以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如果没有统

^①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一规范的语言,文字的拼音化就没有很好的基础。而且,汉语既然成为我国各民族间交际的语言,成为国际间交际的重要语言之一,如果本身没有明确的规范,那么势必增加兄弟民族和国际友人学习上的困难。

汉语规范化,就是根据汉语的发展规律来确定和推广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标准,以便更进一步地发挥汉语的社会交际作用,促使汉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规范化会不会妨害语言的发展?会不会束缚个人的语言风格?规范化是不是禁绝方言?有些人在这类问题上产生了疑虑,应当加以解释。

汉语规范化不会妨害语言的发展。

语言有一定的稳固性,具体表现在确定的规范上。但是语言是发展的,语言的规范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对于语言中所起的变化和已成的规范之间的矛盾,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笼统地排斥一切新变化,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就是否认语言的发展,这当然不对。无选择地欢迎一切新变化,轻易地就承认它们是文学语言,实际上是否认语言的规范,这也是不妥当的。正确的态度是:既承认语言稳定的规范存在的必要性,又承认语言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对于新的变化,要根据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来权衡取舍,要从汉语发展的整个方向来观察。有些变化是语言必然的、健康的发展,应该让它巩固下来,成为稳定的规范;有些变化是偶然的、不健康的现象,应该加以排斥。语言规范化只是为了克服语言内部分歧和混乱的现象,为语言的健康发展开辟平坦的道路,它不但不会妨害语言的发展,而且会大大地促进语言的发展。

汉语规范化不会束缚个人的语言风格。

强调语言的规范化,并不是把一切都规定得死死的,一样东西只允许有一个名称,一句话不能有两种说法。规范化只是把语言里没有用处的东西和混乱的现象淘汰掉。一切有差别的语言形

式,不论是在词汇方面还是在语法方面,不论是在基本意义方面还是在修辞色彩方面,都必须保存下来。语言的规范化和语体的多样化是不矛盾的,同个人的语言风格也是不矛盾的。民族共同语尽管是有一定规范、一定标准的语言,但它的内容是丰富的,范围是宽广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让每一个人自由选择。作家在遵守规范的范围内,只要他善于运用语言,能精心选择适合于表现自己思想感情的材料,那就能创造出他自己的独特的语言风格。有人以为语言风格的形成在于使用方言土语,一旦遵守规范,摒弃方言土语不用,作家就会失去了独特的语言风格。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为了加强表现力,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为了反映地方色彩,作家可以适当地使用方言土语。可是方言土语的滥用却会造成民族共同语的混乱,会妨害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作家的独特语言风格决不是单凭使用方言土语来形成的,而且作家也不应该专在这方面创造自己的“语言风格”。

实现汉语规范化,并不是禁绝方言。

民族共同语推广以后,方言并不会马上消灭,它们虽然在衰亡的过程中,但仍然为一定地区的人民服务。不过活动的范围和影响会越来越小。这是汉语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了民族文化的繁荣,我们欢迎这种发展趋势。即使将来民族语言高度统一了,方言逐渐衰亡了,也不会妨害某些文学艺术(例如地方戏)的发展。地方戏只要继续保持其表演艺术方面的独特色彩,它的艺术生命是永远不会终止的。

二 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标准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汉族人民对语言的统一规范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只有这种高度发展的民族共同语,才能适应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社会的需要。统一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

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一) 语音方面以北京语音为标准

统一汉语语音，必须以一个地点方言的语音作标准音，不能以虚拟出来的语音或者用各种方音拼凑起来的语音作标准音；也不能以北方话整个地域的语音为标准音。因为在北方话中，各个地点方言的语音分歧还是相当大的，不仅重庆、南京的语音系统同北京语音系统不同，甚至天津的语音系统跟北京的语音系统也不完全相同。如果不规定以一个地点方言为标准，就会令人无所适从。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多少年来，话剧、电影和广播等都采用北京语音。北京语音的标准地位，早已为人们所公认了。

作为语音规范标准的北京语音本身，要排除一些特殊的土音成分。如，普通话说：“你这人太难啦！”北京土话说：“你这人推难啦！”普通话说：“论斤买多少钱？”北京土话说：“赁斤买多儿钱？”还有北京土话把“和”读成“旱”、“害”，“我和他”、“他和我”读成“我旱他”、“他害我”。这类特殊的土音，当然不是我们要推广的标准音。

普通话既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每一个汉字的北京话读音应该是确定的，这样各方言区的人才有所依据。但是，有一些字在北京人口里读音并不一致。如“波浪”，读成 bōlàng，也可以读成 pōlàng；“跳跃”，读成 tiàoyuè，也可以读成 tiàoyào；“教室”，读成 jiàoshì，也可以读成 jiāoshì；“比较”，读成 bǐjiao，也可以读成 bìjiào。北京话里的这种异读字有好几百个，这是人们学习普通话的一个负担。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已对一部分异读字进行审订，确定其中一种读音为规范的读音。

(二) 词汇方面以北方方言为基础

北方话的地域最大，使用北方话的人口有六亿以上。北方话词汇从十三世纪以来就随着官话和白话文学传播开来，因而它在全国有极大的普遍性。尤其是解放以来，由于政治的统一，经济的